

平民化新道教产生于两宋之际原因探析

——以全真教为中心

李俊芳

道教的平民化迟于佛教平民化，两宋之际才出现，尽管新道教的产生与内丹思想兴起有关，但是内丹思想不是产生平民化新道教的必然原因，因为信奉内丹者不乏上层社会人士。道教的平民化是社会的需要，吕洞宾成为道教的著名神仙是民间不断神化的结果，正是民间的推动，王重阳在钟吕内丹思想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建立平民化的全真教。

关键词：平民化 新道教 宋代

作者：李俊芳，1969年生，历史学博士，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唐宋变革论自日本学者提出后，常常成为研究唐宋史学者关注的课题，宗教史亦不例外。然而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至少这一时期道教的变革是迟缓不显著的。日本学者涩德忠认为，就宗教史而言，似乎很难在唐宋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因为佛教自唐朝后期即已出现某些新动向，而道教到北宋时期仍是与前代一脉相承的，直到金朝才有新道教的崛起。^① 涩德忠的观点大致无误，只是道教并非没有些许变化，内丹思想崛起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与道教相比，佛教的变化则更为显著，唐代义学宗派衰落，具有强烈平民化色彩的新禅宗崛起，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② 佛教新教派产生很长时间以后，平民化的新道教在两宋之际才产生。余英时指出，唐代中后期兴起的新禅宗、宋代出现的新儒学（理学）和两宋之际兴起的新道教鼎立而三，“都代表着中国平民文化的新发展，并取代了唐代贵族文化的位置”。^③ 这样问题就产生了，平民化新道教属内丹教派，为什么内丹思想崛起那么久，平民化新道教迟至两宋之际才产生？道教平民化缓于佛教平民化的原因何在？笔者不揣冒昧，拟对该问题加以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何谓平民化新道教

前引涩德忠、余英时两先生的话中不约而同提到了新道教，而且都对其产生时间有明确的说明：“金朝才有新道教”；“两宋之际兴起的新道教”。实际上他们都是受陈垣先生的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的影响。陈先生将金代河北新兴的道教派别全真道、真大道和太一道称为新道

① 涩德忠著，箫坤华译《道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88页。

② 刘浦江：《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③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2页。

教。陈先生说：“三教教主乃别树新义，聚徒训众，非力不食，其始与明季孙夏峰、李二曲、颜习斋之论讲学相类，不属以前道教也。”^① 陈先生在书中更多是想表达亡国后悲悯的情怀，故而没有对平民化着墨太多，随着研究的深入，新道教平民化的特征愈发凸显出来，因此，余英时先生明确指出：新道教“代表着中国平民文化的新发展，并取代了唐代贵族文化的位置”。新道教的平民化主要是指这些新产生的道教派别都是真正的民众道教，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太一道创立之初，即“远迩向风，受箓为门徒者，岁无虑千数”。^② 真大道，“以去恶复善之说以劝诸人，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在郡县。”^③ 新道教中的全真教在民众中的影响更大，元好问在《紫微观记》中提到金代全真教在民间影响时说：“耕田凿井，从身以自养，推有馀以及之人。视世间扰扰者，差若省便然，故堕窳之人翕然从之。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今河朔之人，什二为所陷没。”^④ 实际上自王喆创教之始，即把立足点放在民间社会，广泛吸纳社会大众，金人称谭处端传教“不择贵贱贤鄙，不异山林城市，俱以道化。”^⑤ 刘浦江指出“全真道的教旨最能体现金代新道教的平民化特征。”^⑥ 因此，本文以全真教产生于两宋之际作为切入点，揭示新道教的平民化特征。

二、内丹思想并非必然产生平民化新道教

学界通常认为唐末五代外丹开始衰落，内丹崛起，全真教是内丹教派，全真教的建立与内丹思想密切相关，上述观点本身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内丹教派与平民化道教的生产却没有必然联系，虽然平民特别是下层百姓是无能力承担外丹黄白费用，然而内丹思想只为平民百姓修道提供了可能性条件，信奉内丹者并非都是平民百姓，北宋内丹道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

外丹衰落的重要原因是服食丹药者不仅没有实现长生不老，而且造成许多人服食后中毒死亡。清朝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十九中专门讨论了“唐诸帝多饵丹药”，这些服食丹药的唐代帝王包括唐太宗李世民在内，和其他服食丹药者没有区别，多中毒早死。正因为服食丹药可造成人死亡，宋朝皇帝、达官显宦开始对内丹发生浓厚兴趣。《道枢·众妙篇》载有宋徽宗与臣下李傅讨论内丹问题的对话。“徽宗尝问于李傅曰：‘尔有内丹之方，试为我言之。’傅对曰：‘内丹之要，在乎存其心，养其气而已。闲邪所以存其心也。内观所以养其气也。存其心养其气，则真火日炎矣，神水华池日盛矣，可以上下与天地同流焉。’”苏东坡修炼内丹并有心得。《道枢·众妙篇》：“仇池先生曰：铅者，气之谓也，或趋或蹶，或呼或吸，或执或系，故凡动者皆铅也，肺实主出纳焉。故肺为金，为白虎。汞者，水之谓也。唾涕脓血精汗大小溲，凡湿者皆汞也，肝实主宿藏焉，故肝为青龙，古之真人为内丹者，皆曰五行颠倒术，龙从火内出，五行不顺行，虎向水中生。世未有知之者也。龙虎生而内丹成，可以长生不死矣！于道犹未也。”《东坡全集·龙虎铅汞说寄子由》专论内丹铅汞龙虎，内容与此相似。由此可见，苏东坡对内丹铅汞是精通的。他并不满足在理论层面的思考，而且躬行实践内丹之术。《道枢·众妙篇》载有其修炼胎息之术的心得体会。“仇池先生曰：已饥而食，未饱而止，散布逍遥，使其腹虚。当其虚时，即入于定，

①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上海书店，1989年，第3页。

② 《秋涧大全集》卷六一《故太一二代度师先考韩君墓碣铭并序》，《四部丛刊》本。

③ 《道园学古录》卷五〇《真大道教第八代崇玄广化真人岳公之碑》，《四部丛刊》本。

④ 《遗山集》卷三五，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九真人集》本。

⑤ 《甘水仙源录》卷一《长春子谭真人仙迹碑铭》，《道藏》本。

⑥ 刘浦江：《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

无昼夜之限焉。寝也，坐也，皆可以为之矣。惟在摄其身，如彼木偶焉，视鼻端之白，数其息之出入，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至于数百，则其心寂然，其身兀然，与太虚同。于是不待禁制而不动矣！其出入之数也，或至于不能计，吾则与其息具出具入，随之不已，则一息自助，出出入入矣。于是其息或从毛孔之中，八万四千云蒸雾散而诸疾除矣！”上引宋徽宗与臣下的讨论、苏东坡的思考与体验，无不表明当时上层社会中的很多人都热衷于内丹道。

内丹道对上层社会的影响，从内丹道著名代表人物陈抟与当时最高统治者的交往中也可窥其端倪。《宋史·陈抟传》：“周世宗好黄白术，有以抟名闻者，显德三年，命华州送至阙下。留止禁中月余，从容问其术，抟对曰：‘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责，命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受。既知其无他术，放还所止，诏本州长吏岁时存问。”此事亦载于《太华希夷志》。“周世宗召至阙下，令于禁中扃户试之，月余始开。熟寝如故，始异之。因问以黄白之术，抟曰：‘陛下为天下君，当以苍生为念，岂宜留意于此乎？’世宗不悦。放还山，赐号白云先生，令长史岁时存问。”陈抟修炼内丹，外丹黄白之术非其所长。因此，即使最高统治者垂询，他也不能应对。回答不仅没有满足周世宗的愿望，而且还有教训的色彩。就是这样一个曾经惹怒周世宗的内丹高道，却成为宋太宗的座上宾，而宋太宗也并不是向他讨教治国方略，征召的目的是访求修身养生之道。《太华希夷志》：“朕伏惟先生，白云隐士，璧洞高人；悟大道之玄门，达希夷之奥理。朕叹韶光之甚速，讯景难留；忽暑往以寒催，渐颜衰而宾改。虽达治世之略，未谙炼性之机。废侵忘餐，思贤若渴，暂离洞府，跨鸾鹤以飞来；伫立宫闱，列簪纓以放待。”不过这次征召似乎也没有实现宋太宗的目的。《太华希夷志》载陈抟回答宰相宋琪有关提问，并没有提及传授太宗何法。“琪等问曰：先生得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抟遁迹山野，无用于世，修炼之事不知，无所传授。然设使白日飞升，何益于治？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表，洞达古今治乱之旨，真有道仁圣之君。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勤行修炼，无以加此。’”陈抟虽然没有满足宋太宗的愿望，但是从其召见陈抟的目的看，还是对陈抟的内丹修炼养身之术非常感兴趣。从陈抟与周世宗、宋太宗的交往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陈抟是内丹高道，而且还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内丹思想兴起后，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上流社会许多人都对其都非常渴慕，当然我们不否认许多下层民众对内丹学说也是兴趣浓厚，但是内丹学说不是下层民众的专用品，信奉内丹思想的道教也并不必然是平民化的道教。论述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平民化新道教的产生并非完全出于教内因素，而与教外因素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三、平民自己的神仙——吕洞宾

吕洞宾是道教著名的神仙，在其成为道教著名神仙的过程中，曾经受到民间的热捧，他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宋人著作记载了他在民间大量的传说故事，成为名符其实的平民自己的神仙。关于吕洞宾的记载情况，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四《八仙》条曰：“吕洞宾的故事最多，施肩吾有《钟吕传道记》，《雅言杂载》、《青琐集》、《谈苑》、《独醒志》、《辍耕录》、《摭遗》、《古今诗话》、《贡父诗话》、《东坡诗话》、《西溪丛语》、《竹坡诗话》、《庚溪诗话》、《鹤林玉露》各有一二则，《夷坚》所载，更有八则，其散见于说部书者尚多。”的确如赵翼所言，除其提到的上述诸书外，吕洞宾传说故事还见于它书。据马晓宏统计，还有江少虞《事实类苑》、《洛阳缙绅旧闻记》、《岳阳风土记》、《岩下放言》、《东轩笔录》、《闻见后录》、《能改斋漫录》、《墨庄漫录》、《宾退录》、《苕溪渔隐丛话》《集仙传》、《宣和遗事》、《宣和画谱》、《宣和书谱》、《相山野录》、《猷丑集》、《默记》、《佛祖统记》等书，亦各见一二条。^① 以上所提诸书除《钟吕传道记》等书

^① 马晓宏：《吕洞宾神仙信仰溯源》，《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

外，绝大多数是世俗作品，有的书尽管成书于南宋，但书中所记载的故事在北宋民间已经广为流传。当然赵翼的说法也有不确之处。他提到《夷坚志》记载吕洞宾故事有八则，实际上比这要多。姚海英统计，《夷坚志》记载吕洞宾故事包括：乙志卷十七《张八叔》；乙志卷十九《望仙严》；丁志卷十八《张珍奴》；支甲卷六《远安老兵》；支乙卷七《岳阳吕翁》；支丙卷九《陈待制》；三志辛卷三《知命先生》；志补卷十二《文思亲事官》、《真仙堂小儿》、《傅道人》；志补卷十三《曹三香》；再补《治目疾方》。共有十二则。^① 宋人著作中大量记载吕洞宾化身民间救苦匡俗的故事，表明当时百姓是在苦难中生活，需要自己的神仙降临人间来拯救自己，宋人笔记的记载是以民间大众津津乐道为前提的。这也恰好说明了上述著作中的记载，关于吕洞宾的传说中以救世匡俗内容居多的原因。

吕洞宾是平民自己的神仙，还有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编造吕洞宾曾经戏弄宋徽宗时期的佞道林灵素的故事。《佛祖统记》卷四六载：“上与灵素讲道便殿，有青巾弊衣，经升殿不揖，灵素识之曰：‘吕大又来矣。’遽趋殿隅而隐。唯粉书一诗云：高谈阔论若无人，可惜明君不识真，欲问古今休咎事，须防午未丙丁春。上知洞宾之来，为之叹息，后皆如其言。”宋徽宗宠信佞道林灵素，致使国事不可为，百姓遭受苦难，林灵素自然成为百姓痛恨的对象，编造吕洞宾戏弄林灵素的故事，是百姓借助自己心中的神仙，表达对时局的不满与愤怒。

北宋民间为什么选择吕洞宾作为拯救自己的神仙呢？这主要与吕洞宾模糊的身世有关，吕洞宾正史中记载非常简单，见于《宋史·陈抟传》。“关西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正史记载源于王旦、杨亿等撰的《国史》。“关中逸人吕洞宾，年百余岁而状貌如婴儿，世传有剑术，时至陈抟室”。北宋时期关于吕洞宾的较为可靠的记载仅此而已。这与关于陈抟的记载形成鲜明的对比，《宋史》卷四百五十七有《陈抟传》，可见当时依据的材料很多，这种情况与陈抟和上层关系紧密有关。因此，当时留下了很多材料可供后人采摭。而同为隐士的吕洞宾却没有机会接触上层，其地位不高，因此，也就没有留下太多可信的材料。也正因如此，吕洞宾与平民之间的距离要近得多，当百姓需要自己的神仙时，这位与上层没有关系的世外高人，自然成为百姓心中的神仙。也恰恰因为吕洞宾与上层没有接触，留下材料的少，更有利于百姓神化其人，这样一个难得一见、知之甚少的世外高人为百姓编造其神话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因此，当平民需要自己的神仙时，就附会编造了很多吕洞宾的故事，而百姓编造的内容当然是以解危扶困、匡俗济世为主要内容了，因为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以痛苦居多，而摆托痛苦的方式就是幻想神仙来拯救自己。吕洞宾广泛的民间影响是其成为新道教教主的重要原因，这从下文我们对王重阳青睐并不成熟的钟吕内丹思想也可窥一斑。

四、并不成熟的钟吕内丹思想何以受到王重阳的青睐

有关钟吕传道的故事，道教文献很早就有提及。唐代敦煌遗书“伯 3810”写卷中，有一名作为《湘祖白鹤紫芝遁法》的卷子。该卷子提到钟离权创立白鹤紫芝遁道法，并将其传授吕洞宾与韩湘子。其文曰：“夫白鹤紫芝遁，乃汉名将中离翁传唐秀士吕纯阳。纯阳、韩湘子阐扬天教，广发慈悲，交后之进道。难得住世延年，功行不完，未超三届，和光混世，仍在尘寰，如值天劫，兵荒马乱，遍挠天下，无计逃避。噫，惜哉！今以仙术流传于世，夙了道缘。”《湘祖白鹤紫芝遁》今存，收入《万法归宗》卷二。当然这只是钟吕传道内容的一部分，不过这表明钟吕传道的的事情很早，尽管很早，但是钟吕内丹的思想直到王重阳创立全真教时并没有发育成熟完善。其不成熟的表现有二：

^① 姚海英：《洪迈笔记小说与宋代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 年，第 201 页。

其一，当时完整表达钟吕内丹思想的著作尚未问世。钟吕内丹道思想完整的表达，见于施肩吾的《钟吕传道记》，我们不管施肩吾是何时人，或历史上是否存在两个施肩吾，但《钟吕传道记》成书时间很晚是没有问题的。关于《钟吕传道记》成书时间，李裕民考证最为详审。“施肩吾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辨疑论》一卷、《施肩吾诗集》十卷。宋初编《太平御览》，收录道教著作 266 种，未见《钟吕传道记》，北宋庆历元年（1041）编的《崇文总目》、南宋绍兴年间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郑樵《通志·艺文略》以及尤袤《遂初堂书目》均收录了此书。尤袤（1124—1193）书所收《长沙志》绍熙二年（1191）作，此书应作于绍熙三年（1192）至四年（1193）间，最早著录《钟吕传道记》者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此书卷 12 神仙类载：‘《钟吕传道记》三卷，施肩吾撰。叙钟离权云房吕岩洞宾传授论议。’陈书作于淳祐六年一十年（1250）间。^① 据此，可推知《钟吕传道记》应作于《遂初堂书目》成书之后至《直斋书录解题》成书之前，即 1193—1246 年间。^② 李先生的结论无疑是让人信服的，马晓宏研究成果也证明了李先生的结论是可靠的。“乾道间《悟真篇注》，只见引吕洞宾传说诗词，不见引《钟吕传道集》，或许此书出南宋光、宁时。”^③ 以上研究成果表明，在王重阳建立全真教的时候，《钟吕传道记》还没有问世，也就是说钟吕内丹思想在当时还没有最后成熟定型，处于孕育发展过程中。

其二，世人在《钟吕传道记》成书前所传钟吕思想多属外丹范畴。按照《钟吕传道记》说法，钟吕思想是内丹思想。但李裕民明确指出，北宋时期所传钟吕讲的是外丹，这从《铁围山丛谈》、《宋史》中讲钟离给王老志“丹”，王服后发狂，即可看出。还有一个明显的证据，《能改斋漫录》卷十八所载吕洞宾自传石刻说“因游华山遇钟离，传授金丹大药之方”。《能改斋漫录》成书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此石刻，崇宁时作的《岳阳风土记》未载，则其年代应为北宋末或南宋初所作。^④ 尽管这可能只是当时关于钟吕传道记载的一部分，但已经可以足够说明问题了，一个广为人知、家喻户晓人物的思想被误读十万八千里，一个合理让人信服的解释，就是吕洞宾的内丹思想当时没有成熟定型，并不为世人所真知，否则不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内丹与外丹的根本性理解差异。王重阳对钟吕尚未成熟定型的内丹思想情有独钟的原因何在？^⑤ 一言以蔽之，建立平民化道教的需要。吕洞宾是平民神仙，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全真教要为广大民众认可接受，就需要吕洞宾这个平民神仙作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因此，即使吕洞宾的内丹思想当时还没有定型，王重阳仍然以其作为自己思想的原点，予以阐释发挥。

平民化新道教的出现迟于佛教平民化，是因为佛教自身的内部变革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而五代、北宋时期道教的变革是因为外丹存在致命的弱点造成的。修炼外丹多为上层社会成员，故而内丹兴起没有必然使道教走上平民化的道路，而此时平民恰恰需要自己的神仙来拯救自己，道教没有满足他们。但民众是富于智慧的，当道教没有提供这样的神仙时，平民自己找到世外隐士吕洞宾，不断神化他，编造了他许多救世匡俗的神化传说，这种社会的要求最终影响了道教。因此，才在两宋之际出现了平民化的新道教。

（责任编辑：于光）

① 参见陈乐素：《求是集》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 年。

②④ 李裕民：《吕洞宾考辨—揭示道教史上的谎言》，《山西大学学报》，1990 年第 1 期。

③ 马晓宏：《吕洞宾神仙信仰溯源》，《世界宗教研究》，1986 年第 3 期。

⑤ 当时内丹思想的代表人物还有陈抟、张伯端等。